

# 绩点之外的新「战场」

■本报记者袁雪



曾经，“绩点为王”是校园里的“潜规则”。而今，随着顶层设计对“改革学生评价，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强调，一些绩点不尽如人意的同学，也有望通过参加大赛或去国际组织实习而获得加分，实现“弯道超车”。实际上，无论是绩点还是加分，都关乎一个问题：我们拿什么来衡量未来所需要的人才？

再过几天就是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初试时间了。此时，已顺利推优的复旦大学理工科大四学生许可既有成功上岸的喜悦，也有“劫后余生”的庆幸。

就在他参加保研推免考试的前夕，收到了学校今年保研推免政策将按教育部最新文件进行改革的通知。

在临门一脚时发生这样的变化，许可深感茫然。“此前，我几乎一心扑在提高绩点和准备研究生考试上。但这样一改，那些在舞蹈、体育大赛中获奖以及去国际组织实习的同学就有了‘弯道超车’的机会，多了加分的可能。”

## 政策突变引发焦虑

根据教育部最新文件，复旦大学公布的保研推免政策是，申请人平均绩点成绩被折算为百分制学业综合成绩，再按70%权重计入遴选总成绩；申请人参军入伍服役、参加志愿服务、到国际组织实习、科研成果优秀、竞赛贡献突出等指标，经学校推免遴选工作专家审核小组严格审核后认定后，按最高30分纳入遴选总成绩……

该政策一经宣布，立刻在校内引起讨论。有位自称复旦大学大三在读的学生，在知乎上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这样的政策下，即便自己再努力，成为“做题家”，也无法赶上那些“好吃懒做”却拥有国际组织实习经验或者在大赛中获奖的人。

作为分管教学的副主任，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马臻在学校推出文件之前，就已经通过电子邮件、微信、电话等方式与有意保研的学生进行了沟通，提醒学生早

做准备，并回答了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我们学校推免名单公布后，没有收到任何反对意见。学校整体也进行了公示。”

面对网络上对于复旦大学此次推免政策的质疑，马臻认为，首先无法确定该名学生的真实性；其次，所谓加分项，并非单项加30分，而是一位学生所有加分项累计不超过30分。在复旦大学，保研分为“推出”（学生获得推荐资格）和“接收”（学生申请的院系确定录取）两个步骤。获得“推出”资格的学生可以参加外校“接收”面试，也可以联系参加本校“接收”面试。

“往年复旦大学‘推出’步骤综合考查学生的绩点和面试成绩，择优录取。”马臻表示，而今年，复旦大学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进行调整，“推出”步骤综合考查学生的绩点（满分70分）和30分加分项，“接收”步骤只看面试成绩。即便有少数学生有潜在加分内容，他们也需要通过学校的答辩才能获得加分，而且还要公示。

推免名单出来后，许可发现只有少数学生获得了额外加分，这让她在稍稍松了口气的同时也为学弟、学妹们捏一把汗。“今年我们还是以学习成绩为主，那么明年是不是就会有人为了拿到加分项特地去国际组织实习，或者去参加个很水的比赛。这对于真心想在国际组织工作的同学来说不见得是件好事，其他人可能会认为他们有利可图。”许可坦言。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此次的改革是对破“五唯”中的“唯分数”进行回应，“增加的内容让评价依据更加多样，且国际比赛设置的评判标准相对比较刚性。过程可信，进而增加了对学生评价的刚性。就此而言，这是一项良性的改革。”

## “绩点”背后的潜在逻辑

曾经，“绩点为王”是校园里的“潜规则”。为了保证更公平，高校衡量学生学习的计算单位是平均分绩点，即将学分与绩点进行计算，并以取得一定的学分和平均分绩点作为毕业和获得学位的标准。

在高校，不论是选修双学位、读研、出国留学还是找工作，绩点都是基本保障。为了追求绩点，一些学生不惜选修高且通过率高的课程，但可能对自己没什么用的课程，浪费了不少时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曾经用了4年时间做了200多个学生的访谈。她在分析结果时认为：“学年或总评学习绩点=所学课程学分绩点之和÷所学课程学分之和。因为所有课程均参与计算，所以就课程对绩点的贡献来看，除了学分大小有差异之外，课程的其他特征都被夷平了。”

目前在美留学的刘聪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提到，在国内高校就读时，哪门课教师给的分高，学生就选择哪门课的情况很常见。“我们经常问学长，这门课不严重、好不好过、给的分高不高，以至于一些很重要的课无人选，一些不那么重要的课却有很多人选。”刘聪说，他们称这种课为“水课”。

这也是绩点背后逻辑的一部分。除了得失之间的谨慎选择，高绩点还意味着内卷化。

内卷化是最近新出的网络流行词。现在很多高校学生用它来指代非理性的内部竞争或“被迫”竞争，即为不被别人的勤奋与优秀落下，就不得不逼迫自己更勤奋、更优秀。例如，一门课程的教师要求大家提交3000字的论文，后有学生发现字数越多越能拿到高分，于是所有人都使出浑身解数卷

人字数的竞争。

许可的本科并没有陷入“水课”的纠结，“我的目标一直很明确，不会选择对自己没有用的水课”。但她却没有逃过绩点背后的内卷化，同时担心推免政策改革后可能会引发新的内卷。

## 被曲解的评价体系

在马臻眼中，绩点成为让学生钻营的“内驱力”，是对绩点的误解。“有些老师对学生说，‘绩点很重要’，并不是因为绩点决定人一生的成功，而是以此让学生好好读书，不要荒废大好时光。”在马臻看来，为了防止学生“混大学”，高校对于学生毕业有自身的底线要求——绩点必须高于某一个数值，这是一种强迫性的评价。“除了底线要求，大学并没有强迫学生用绩点来参评——你可以选择用绩点来竞争奖学金、保研名额，也可以选择‘不跟他们玩’。”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操太圣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也表示，绩点反映的只是学生课程学习的情况。这些课程是指显性的，在培养方案中列出的学习科目，且以知识学习为主要形式。“从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术性学习和社会性学习等多元学习方式来看，绩点只能部分反映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状况。”

他补充说，除了绩点外，参与竞赛、国际组织实习、论文发表等其他要求，正反映出学校响应国家有关教育评价的政策精神，尝试更多元地评价学生，以期破除“五唯”，引导学生更全面地发展。这些新的评价维度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校对时代新人素养的关注，如具有创新精神、较强的竞争力、国际视野和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能力等。“如果从遴选研究生的角度来看，重视上述能力的考查与评价是合适的。”

对于有人对国际竞赛等“加分”的“吐槽”，马臻认为，这是他们戴着“有色眼镜”看，且不明真相。因为现实是，学校能获得加分的学生并不多，加的分也不多；有的人即使加了分也没能“推出”；有的人即使加了分，名次提前了，也不影响他原本不需要加分就能“推出”的事实，对他人能否“推出”也不构成影响；还有的人虽然因为艺术团团长、做科研发论文获得加分，但前期在这些事情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可能也因此影响了绩点。而有的学生（比如准备留校当辅导员的）通过答辩获得加分后按照总分排序如能进入院系“推出”名单，那么学校会相应增加“推出”名额，不占院系常规“推出”指标，不影响其他学生。

## 衡量未来人才的标尺

不论是绩点还是加分，都是不断调整学生评价体系的尝试之举。

今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并在其中第四条强调“改革学生评价，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对此，操太圣认为，不论是绩点还是其他评价方式，归根结底，都是衡量未来需要什么样人才的标尺，“其内涵规定性才是我们进行学生评价时要关注的重点。因此，不忘人才培养之本质的，灵活采取多维的方法才是应有之义”。

储朝晖举例说，当年我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叶企孙正是在日常授课中发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的才华，才举荐他去美国留学，进而有了李政道日后的成就。“任何一种评价都会对被评价方造成压力，如果要淡化这种竞争性和选拔性带来的压力，就需要评价在日常中进行，但目前评价标准过于集中和统一。”（下转第6版）

## 中国大学评论



樊秀婕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对教育科研的投入逐年增加，论文数量也已冲到了世界顶端，但却少见产出重大原始创新科研成果。我国的科研人员不可谓不努力，也不可谓不聪明，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看来有必要回到科研人员是不是在朝着科研创新方向努力这一根本问题上溯源。

据笔者的观察和调研，当下大多数科研人员认为，获得“学术大师”的赏识和提携，远比做出重要的科研成果要紧。也就是说，大多数科研人员开展科研活动的主要心思不是在科研创新，而是在如何迎合“学术大师”上。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各种重大项目、科研成果层出不穷，可就是缺少有“灵魂”的重大原始创新成果。问题的根源主要不在科研人员身上。因为没有“学术大师”的首肯，客观上大多数科研人员的确有良好发展。高度集中和强化“学术大师”的绝对权威，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创新科研人才的成长和科研创新的产出，这样的局面亟待改变。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下的年轻科研人员普遍认为，傍上“学术大师”是事业起步和成功的先决条件。现实也是如此，年轻科研人员想要申报重要课题和争取各种人才计划（人才“帽子”），没有“学术大师”在评委中打声“招呼”很难成功。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年轻科研人员在人生精力最旺盛、思维最活跃的科研关键期，热衷的不是做出造福人类的伟大发现和发明，而是要学会看着“学术大师”的“脸色”为人做事。当然，并不是说年轻科研人员不应该参加科研团队。只是疑惑年轻科研人员缺乏敢为天下先的闯劲和拼劲，一切只为迎合“学术大师”的需求和满意，这样的态势下，科研活动怎会有创新的“火花”和成果？

同时，稍上年纪的科研人员，如果没有像样的学术资历（如人才“帽子”），在“学术大师”绝对权威的评价体系下，即便能拿出优质科研成果，也难有被发现和认可的机会。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只能无奈自嘲“识时务者为俊杰”而退出竞争，不再去挑战高难度。其实，他们中不少人都本可以成为相当有潜力的创新人才。

形式化、表面化的学术评价是“学术大师”绝对权威形成的根本原因。行政管理强调政绩，所以各种评估、评比、评奖活动众多。各种行政化的科研评审活动一般都是通过“学术大师”来实现，而“学术大师”绝对权威的问题也就产生于此。行政管理部门聘请专业人士担任各种评委，一般情况下谁的学术地位越高谁就更具“话语权”，所以“学术大师”的意见对相关评审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以数量论英雄的行政主导评审标准下，面对大量的评审材料，评委们（包括“学术大师”）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一般都不会对评审材料细加研判，这就使得获得“学术大师”青睐的人因“好印象”而胜出。而这种“专家决议”的评审结果其他人也无法提出疑义，绝对权威由此形成。

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创新，学术领域不存在绝对权威。一旦“学术大师”以绝对权威的姿态出现，就有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错误与损失。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的“汉芯一号”造假事件，造假者将从美国买来的芯片加上自己的LOGO，摇身变成了“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成果，如此粗劣的造假手法，而且没有实现量产，何以能欺瞒三年之久？事实上，国内类似的重大学术造假“成果”，都经过一层层严格鉴定评审，评委也都是国内顶级专家，可为何一次次都无法识破？这与国内顶级“学术大师”的绝对权威不无关系。即使“学术大师”主观上没有什么问题，但长期忙于行政事务和应酬交际，对专业核心知识和前沿状况可能已经生疏，还以学术权威自居，很容易被学术不端者甚至违法犯罪分子所利用。

要改变凭实力、凭成果不如“靠山”的科研成才观，唯有让科研评价回归到科研成果内容本身。每个科研人员都享有科研成果得到公平、公正评价的权利。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不唯成果“主人”的年龄、资历和“门派”，而唯成果内容的实际水平和贡献。只有这样，才能在全体科研人员的心目中树立唯有真才实学才能在学术圈内发展得“顺风顺水”的正确价值观。如此，才能让科研人员把追求科研创新作为成才的第一目标，让科研人员把获得创新成果作为科研事业最大的使命和成就。

为此，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加大科研评价去行政化的力度。科研行政管理的主要职能就是服务，要减少各种不必要的科研评估、评比和评奖项目，不要把对科研人员等级和“标价”作为科研管理的主要抓手和政绩。如果没有高质量的创新成果，宁缺毋滥。这样才能让广大科研人员减少非学术的成才焦虑，安心去踏实做科研创新。

另一方面，要加大弘扬科学家精神的力度。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 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2019年9月，十名科学家联名发表了“弘扬科学家精神树立良好作风学风倡议书”，建设良好的科研作风和学风，“学术大师”要做出表率，否则难见成效。相信在破除绝对权威、风清气正的学术氛围里，优秀创新科研人才和科研成果会大量涌现。

（注：本文为同济大学“教育科技评估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2120200324）阶段成果）

# 『凭实力不如靠山』当休矣

## “研究生不会提问”之思

# 从费孝通“四心”反思当代研究生之所失

■常赛超

为什么研究生提不出问题？这一醒目的论题引起国内学者普遍关注、深度解析，同时，也刺激着研究生的神经，自然引起了我——一名在读博士研究生的沉思。

前不久，在导师带领下，我们团队来到苏州吴江开弦弓村调研学习，听取了苏州科技大学教授陈建新题为“纪念费孝通，做脚踏实地、爱国富民的学术研究”的演讲。今年适逢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80多年前，身为研究生的费孝通在开弦弓村调查访谈基础上完成了著名的《江村经济》，此后费孝通一生26次考察开弦弓村。这个村被学术界命名为“江村”，成为国际上著名的社会学研究圣地。

江村之行让我深入思考：为什么要做学术研究？如何做出好的学术研究？费老的成功之道可以用四种“心”来概括：一是担当之心，二是好学之心，三是求实之心，四是勇敢之心。正因如此，费老才能志在爱国富民，坚持脚踏实地，写出鞭辟入里的学术名著。再将视线拉回我们自身，或许就能找出“为什么研究生提不出问题”的原因。

格局小，缺少了担当之心。当下的研究生很少有入胸怀天下、志在利民，更多关注的是自身发展，每天谈论的话题是毕业面临

的就业压力、买房买车的焦虑。人的关注点在哪里，格局便在哪里。费老时刻关心着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发展，将毕生精力扑在乡村和贫困地区调研上，晚年视野扩展到“天下大同”，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责任与担当。对比之下，我为生我、养我的农村做过什么？有担当之心，总有可为之事。在决胜小康、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作为一名高学历的博士生，我能否赴乡村“扶智”，帮助农村的家长教育子女，培养更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作为一名企业家的博士生，我能否投入和费老一样的热情，扎根中国基层企业，关心企业的发展，做出帮企业解困纾危、真正有用的研究？

读书少，缺乏好学之心。老师们教诲我们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扪心自问，我们对“巨人”知晓几何？除了教材，我们读过多少“巨人”的著作？我们了解多少他们思考过的问题？所以，提不出问题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知之甚少，更深层的原因是缺乏好学之心。没有挨过知识的“饿”，便不会有对知识的强烈渴求。就我个人而言，习惯于被动地接收知识，老师讲，我来听，知识自然流进脑中，以为这就是学习。既然知识得来如此容易，思考和探索就失去了动力，不知不

觉惰性思维彻底遮蔽了好学之心。好学之心何等重要。它是推动我们自觉思考、产生疑问、提出问题、寻求解惑的原发动力。如若丧失好学之心，问题又从何提出？

脱离实际，缺乏求实之心。真正的学术研究一定要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唯有深入实际、了解实际，脚踏实地，方能做出掷地有声的成果。费老一生“行行重行行”，一步一个脚印，扎根田野调查。从江村出发，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国老少边穷地区，用一生实地调研，实现其富民之志。另外，费老做学问的真功夫讲求既能“具体”下去，又能“抽象”上来。费老经常讲，要多观察、多记录、多思考。他总是深入农户家中，在具体环境中聊天，由此上升到理论，提出了一个个对我国乡村建设与城镇发展具有真知灼见的对策建议。相比之下，我们有多少精力和热情付诸实际？

不敢挑战，缺乏勇敢之心。费老一生，几经坎坷但从未倒下。青年时代新婚妻子不幸遇难，他并没有沉浸于悲痛而消沉，而是在养伤期间酝酿了著作《江村经济》，奠定了一生的学术基础；中年遭受不公正待遇被打为“右派”，改革开放后重返学术阵地，以极大的勇气重建中国社会学；晚年从对乡村的关



常赛超

注到对城镇化的关注，从提出区域协调发展到对“天下大同”的向往，每次思想的跨越都是一次勇敢的挑战。反观当代研究生，当出现理论与常识不符时不敢质疑，或因底气不足，或因受质疑便是不敢的思想桎梏，从深层次讲其实是缺乏勇敢之心。当今世界处于科技革命前夜，我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学术研究创新立说的大好历史时期，研究生作为初窥门径的学术后备军，更不能缺少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敢之心。（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